

必也正名乎

——吕思勉《医籍知津》与谢观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关系辨证

王珂

摘要: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是一部学界公认的医史经典之作,过去人们都认为该书作者是现代著名中医学者谢观。近年公布出版了一批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及相关新史料,其中有一部题名《医籍知津》的书稿,从总体结构与文字内容来看,均与前者大同小异。本文通过缜密比勘和考辨,发现《源流论》实际是谢氏据《知津》增订而成。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,有必要将《源流论》的作者署名修正为:“吕思勉撰,谢观增订”。

关键词: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;谢观;《医籍知津》;吕思勉;作者署名

DOI: 10.16382/j.cnki.1000-5579.2019.01.007

一 一桩罗生门式的学林公案

无论是在医史领域,还是在中医学界,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(以下简称《源流论》)都被视为必读之作。该书篇幅不大,仅六万字左右,但内容周备,伦脊分明,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来龙去脉与利病得失均有十分深刻且通达的认识,并给予了扼要而中肯的评价,堪称一代经典。



图一 初版《源流论》内封



图二 初版《源流论》首页



图三 初版《源流论》版权页^①

《源流论》最初于民国二十四年(1935)被收入中医大家谢观(字利恒)先生的全集,书前有谢氏弟子秦伯未之序,序文开宗明义地写道:“武进谢利恒先生,于编辑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后,复著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……脱稿业经十载,曾于《国医公报》《医界春秋》刊布,海内医家,叹为绝作。近日及门诸子,为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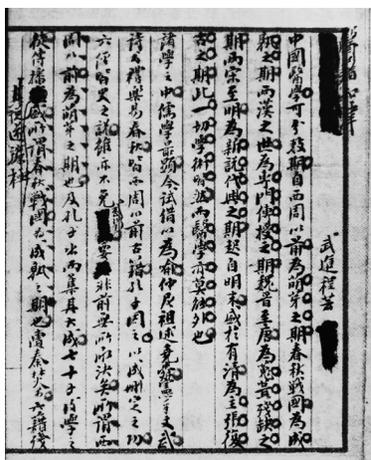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简介】王珂,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(西安,710065)。

① 图片源自孔夫子旧书网:<http://www.kongfz.com/>。

生编印全集,复以此篇冠其首”^①,非常清楚地交代了《源流论》的作者及撰写缘起。由于谢观先生与史学大师吕思勉(字诚之)先生有同乡之谊兼世交之情,故谢氏邀请诚之先生为其作传,并将传文弃诸书首,以增光彩。翫翫传主的主要著述是一篇合格传记的题中应有之义,此传自不例外,而位列第一者正是《源流论》。另外,吕先生在1953年完稿的《隋唐五代史》中征引了《源流论》第八节《〈神农本草经〉考证》中的一段文字,亦写明作者为“谢利恒”^②。职斯之故,无论学界还是公众,都视谢观先生是《源流论》当仁不让的作者,从无异议。但风起于青蘋之末,早成定讞者,竟因一部遗稿的出版,在七十多年后变成了一桩罗生门式的学林公案。

2009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《吕思勉文集》系列之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(以下简称《九种》)。顾名思义,是书收录了诚之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九部论著。九书中列于最前者,题作《医籍知津》(以下简称《知津》),并附有吕门高弟著名文献学家胡道静先生所作《吕诚之先生〈医籍知津〉稿本题记》(以下简称《题记》)^③。编者李永圻、张耕华先生在全书《前言》中对吕先生这份遗稿的撰写背景与整理出版经过做了扼要说明:

《医籍知津》写于一九一九年夏,是年吕先生由谢利恒(观)先生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,协助谢先生编纂《中国医学词典》,撰《中国医籍^④源流论》一篇,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及其源流派别。《中国医籍源流论》后未收入《中国医学词典》,由谢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许册分送同行友人。《医籍知津》手稿一册,五万余字,即《中国医籍源流论》的底稿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《医籍知津》经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抄录,并与杨宽先生一同校对、补正、分节并加标题。胡道静先生审阅后,撰写了《题记》。此次刊出,以抄本为底本,并校以原稿,胡先生的《题记》用作附录,以供读者参考。^⑤



图四 《知津》手稿首页^⑥

两位《吕集》编者提出了迥异于通行观点的意见,认为《源流论》的真正作者应是吕思勉先生。不过很可惜,他们的话说得比较委婉含蓄,且一笔带过,未做进一步的解释。2012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、张二人编撰的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(以下简称《吕谱》),这段文字略经修改后亦被收入其中,同时随文附有一帧《知津》原稿的高清照片。该照所摄系手稿首页,竖栏,半叶十行,楷书,笔画劲秀,间有涂抹圈改。其首行顶格题:“医籍知津”四字,下署“武进程芸”。“武进”系常州旧称,“程芸”则是吕先生常用笔名之一,结合笔迹判断,《知津》一稿确为诚之先生手书。但细检《吕谱》之文,并无吕先生曾在手稿上注明书写年月的记载,故“《知津》写于一九一九年夏”当是另有所本。据《吕谱》所引文献,其依据实源自1952年“三反”期间诚之先生撰写的《自述》。这篇文章中,吕先生对个人平生事业和思想做了详细而又坦诚的总结^⑦,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先生在叙述昔日经历时,谈到了与谢观先生的一段交游往事:

① 谢观著、余永燕点校、王致谱审定: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,福州: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4年,第7页。按,此书标点错误甚夥,且颇有鱼鲁豕亥之讹,使用时应多加注意。

② 参见吕思勉:《隋唐五代史》第二十二章《隋唐五代学术》第六节“自然科学”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1139—1140页。

③ 按,此文原载于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7年第2期,发表时删去了文末三段文字。

④ 按,“医籍”当是“医学”之讹。

⑤ 李永圻、张耕华:《前言》,载吕思勉: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3页。

⑥ 图片翻拍自李永圻、张耕华编撰: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205页。

⑦ 此文原名《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》,今改题作《自述》,收入吕思勉: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741—757页。

一九一九年,入商务印书馆,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辞典。予于医学,本无所知,而先外王父程袖谷先生,先舅氏均甫先生,先从舅少农先生,皆治汉学而兼知医,故予于中国医书源流派别,略有所知。谢君本旧友,此时此书亟欲观成,乃将此一部分属于襄理,至暑假中事讫。^①

细审此言,尽管吕先生透露了自己曾在1919年暑假中代谢氏撰写《中国医学辞典》中有关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的部分,但毕竟没有明言这部分文稿就是《知津》,而且《自述》通篇无一字提及此作,所以用严谨的逻辑来考量,李、张二人径定《知津》手稿写于民国八年(1919)未免有牵强之嫌。又据前引秦序推算,《源流论》杀青当在民国十四年(1925)。在无法判断吕先生《知津》遗稿书写时间的情况下,也就不能确定两者写定时间孰先孰后,故仅以诚之先生手稿与《自述》为据,尚难分辨《知津》究属吕氏原创,抑或仅是抄录删改谢书而成。可是《知津》手稿的公布与整理出版,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疑问:《源流论》的作者到底是谁?

近现代以降,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,不同学科甚至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彼此之间往往十分陌生。具体到历史与中医学界,这种术业有专攻的情况也相当突出。中医学者平日很少涉猎史家论著,大多数历史学者对传统医学亦不甚了了。因此,当久湮不彰的《知津》公之于众后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并未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注意。2013年3月20日,《中华读书报》刊发了流行病学专家祖述宪教授的一篇文章:《〈中国医学源流论〉真正的著者是谁?——史学家吕思勉的〈医籍知津〉显露真相》。祖先生对比阅读了《知津》与《源流论》,发现两者“基本内容相同,只是编辑不同,标题各异”,经过探寻分析,认为后者实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头换面而来^②。此结论不可谓不重要,但奇怪的是,学界依旧波澜不兴。研究者在征文引献时,凡涉及《源流论》处,仍径视谢观为该书作者,对成书背景不做任何辨析与讨论^③。究其原因,除上文提到的学科壁垒外,恐怕还与祖文论证比较粗疏有一定关系。祖氏在其文中坦承:“我对中国历史只有一点零星的常识。”^④由于并非文史专业出身,祖先生的考据实在难称当行。不仅资料搜集得很不完备,如不曾利用《吕谱》等论著;考证亦颇欠周密,多凭臆断之见,甚至诛心之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。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,让人难以采信。

《知津》与《源流论》的复杂关系牵涉到两位前贤大家的著作权,尤其需要我们实事求是,审慎辨析。故吾人不揣谫陋,尝试另辟蹊径,全面利用已公布的文献材料,对这桩难解公案重加考证,彻底解决其中的疑点,以期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,求得一个客观公允的答案。

二 《知津》《源流论》内容比较

从章节结构来看,《知津》共分三十节,《源流论》则由六十五节组成。不过,前书的分节出自整理者之手,故无比较之意义,可存而不论。应该说,其同异处主要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。比勘二书,可以发现后者末尾尚有“民国医学”“时代病”“地方病”与“结论”四节^⑤,约计四千余字的篇幅,为前者所无;除此

① 吕思勉:《自述》,氏著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744页。

②④ 参见祖述宪:《〈中国医学源流论〉真正的著者是谁?——史学家吕思勉的〈医籍知津〉显露真相》,《中华读书报》2013年3月20日,第13版。

③ 此类论著颇多,仅吾人浏览查询所知者即指不胜屈,兹略举数例:张瑞:《疾病、治疗与疾痛叙事——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》(知网,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14年),李楠:《民国时期(1912—1949)中药文献及其学术考察与研究》(知网,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,2014年),韩毅:《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:宋代医事诏令研究》(北京: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4年),韩毅:《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》(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年),陈昱良:《明清学术视野下的伤寒学研究》(知网,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,2016年),刘金鹏:《陈直〈养老奉亲书〉研究》(知网,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6年),李建民:《从中医看中国文化》(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6年),胡岷:《〈金匱要略正义〉训诂研究》(知网,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7年),熊秉真:《幼医与幼蒙——近世中国社会的绵延之道》(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,2018年)等等。

⑤ 参见谢观著、余永燕点校、王致谱审定: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,第113—121页。按,祖氏并未认真比读两书,误认为:“谢书比吕著多了最后的六节——中西汇通、东洋医学、民国医学、时代病、地方病和结论”,实则“中西汇通”、“东洋医学”两节内容,《知津》中亦有。

之外,则基本相同。换言之,《源流论》全书近九成的文字与《知津》差别不大。当然,这部分大同中也有不少小异之处,主要分为三类,一是具体字词的出入,数量甚夥,有近五百处。兹举两例,以概其余:

甲

盖医理深邃,非尽人所能知,方药则事足便民,好蒐辑之者较众;又格物之学不明,徒知蒐辑成方以治病,而不复能研求药性,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。^①(《知津》八《宋以后医方之蒐辑传播》)

盖医理深邃,非尽人所能知,方药则事足便民,好蒐辑之者较众,而流传亦易,但格物之学不明,徒知蒐辑成方以治病,而不复能研究药性,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。^②(《源流论》十四《宋明间医方》)

乙

其晚年高弟为罗天益,尝承师命作《内经类编》一书,书不传,序见刘因《静修集》中。实居张景岳《类经》之先,盖举一切治病用药之法,而悉归本于《内经》,实至东垣而大成其说也。^③(《知津》九《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》)

而其晚年高弟为罗天益,尝承师命作《内经类编》一书,书不传,序见刘因所著《静修集》中。实居张景岳《类经》之先,盖举一切治病用药之法,而悉归本于《内经》,实至东垣而集其大成也。^④(《源流论》十七《李东垣学派》)

显而易见,甲、乙两组引文都只是措辞有些细微差异,文义则几乎一致,与之相似者在此种类型的异同中占绝对多数,故量虽大,却并未造成质的迥别。观点略为不同者,仅见一处:

凡事创始最难,今日医家有能引此端绪者,筭路蓝缕之功,固足以没世不忘矣。若如今日中医奉为枕中秘之《中西医经汇通精义》等,一味牵强附会,及近今治西国医学者,动以今日之学术绳古人,一味深闭固拒,均无当也。^⑤(《知津》三十《医史医案医话与医书》)

凡事创始最难,近今医家有能引此端绪者,如唐容川之《中西医经汇通精义》之类,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,然筭路蓝缕之功,固足以没世不忘矣。今日治西国医学者,动以今日之学术绳古人,而深于中医旧学者,又一味深闭固拒,均无当也。^⑥(《源流论》六十《中西汇通》)

对读上引两段文字可知,分歧点主要是对唐著《汇通精义》的评价,前者贬,后者褒,但这样的小结裹实与全书宏旨无关,故也毋庸强调。

其二,是《知津》无,但《源流论》有的一些论述,约计二十余处。这里必须说明的是,此类论述并非简短的句子,而是首尾完具,意义周备的段落。具体言之,又分两种情况:一种是两者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相同,但行文各有侧重;另一种是后者较前者做了更多的发挥。亦不妨各举一例:

甲

种痘之在今日,自当采用西医最新之法,前此种痘之书,不过藉以考见源流而已。然中国今日,种痘不能普遍,患天痘者仍随在有之,且中医诸疹治法,皆与治痘相出入,故医家于前此治痘之书仍不可不究。^⑦(《知津》十七《女科与幼科》正文夹注)

种痘之在今日,自以采取西医新法为便,然胎毒重者,对于天痘仍不能免,即成人方面,亦有因流行性而感受者。往年治痘专家,对于温凉攻补,大都纯熟,应付变化,如珠走盘,其治效实非西医所及,今则通都大邑,种痘盛行,于是治痘之法渐晦,甚为可惜,故医家对于此层,仍宜研究也。^⑧(《源流论》四十《痘疹学》)

乙

《源流论》四一《推拿学》末尾较《知津》十八《推拿》多出一段话:

①③⑤⑦ 吕思勉:《医籍知津》,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,第20页;第25页;第67页;第50页。

②④⑥⑧ 谢观著,余永燕点校,王致谱审定: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,第33页;第40页;第110页;第83页。按,凡文字有出入处均下加重符号,下同。

近年沪上盛行推拿法,于不运动之膏粱身体最宜,幼科推拿亦甚效,其著于书者,则有骆如龙溧阳人《幼科推拿秘书》商务书馆出版等书。^①

其三,《知津》和《源流论》二书虽然章节划分各异,但整体框架是基本吻合的,仅有少数章节的段落顺序有所不同,如讨论晋唐间针灸学、宋以后医学新说之代兴及清代医家等问题的部分。这些局部结构的颠倒变化就好似“朝三暮四”和“暮四朝三”,对全书的立意与宗旨实际并无影响。限于篇幅,此处不再征引比较,且亦毫无必要,因为两书具在,一检即得。

通过以上比较,我们已可确定:《知津》《源流论》两书的内容大致相同。显然,出于不同作者之手的著作绝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巧合。那么,就只剩下两种可能,要么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删改而成,要么后者是前者的补订升级,非此即彼,必居其一。

三 在《知津》基础上成书的《源流论》

根据前文的考辨,仅凭外证,我们无法对《知津》与《源流论》的关系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。职是之故,吾人尝试从内证入手,另寻线索,以求得问题之解决。

首先,需要回答的问题是:吕思勉先生是否具备撰写《知津》的能力?医籍史在史学园地中一直是比较特殊的门类,并非人人可以轻易置喙。诚之先生在《自述》中说:“予于中国医书源流派别,略有所知”,这不过是老辈的自谦之辞。诚如胡道静先生所言:“先生读过的古典医籍之多,钻研之深,是罕有伦比的。”^②1920年至1922年,吕先生应邀远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,在此期间,曾以“中国医学的变迁”为题,在孟晋迨群社做特别演讲,^③这足可窥见其深湛的医史造诣之一斑。故以客观条件论,吕先生完全具有撰写一部中国医籍史的雄厚实力。

前提既可成立,更进一步的考察也就能够展开。诚之先生一生著述宏富,作品中有不少与医学相关的文字,取之与《知津》对读,可以发现相似处甚多。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,看看能否从中找寻到《知津》作者究竟为谁的可靠证据。《知津》二《最古医经:〈素问〉、〈难经〉、〈灵枢经〉》言及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集》时,以小字夹注的形式对“论集”加一按语:

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,宋本如此。后世刻本改为自序,非。^④

民国八年,吕思勉先生曾以笔名“弩牛”在家乡常州的报刊《武进商报》上发表了一组题名《论医》的文章,^⑤其中第六则有一句话:

《论集》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,宋本如是,俗刊本改为自序,非。^⑥

比较两句话,不仅观点相同,连文字也几乎一致,而后的发表时间又正好与吕先生受谢氏委托撰写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中有关医书源流派别部分的时间重叠,这绝无巧合的可能。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《知津》一稿确实撰成于1919年,较《源流论》脱稿要早六年之久,前者不可能是据后者删改而成。

尤有意思的是,《知津》四《〈伤寒杂病论〉与〈金匱要略〉》在讨论《伤寒》卷帙数时说:“《伤寒杂病论》论集自言凡十六卷。”^⑦结合上引同书第二节的按语,可以看出诚之先生行文相当谨慎,用字前后照应,无粗疏草率之病。这两句话在《源流论》中,第一句与《知津》完全相同^⑧;第二句则有微妙的出入,作:“《伤寒杂病论》序文自言凡十六卷。”^⑨此处,谢氏似乎不明就里,轻率采用了前文所批评的俗本妄改之文。仔细揣摩,只有在《源流论》是据《知津》增订而成的情况下,才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错误。何以言之?因为增订者并非原作者,虽照录了有关“论集”的那条夹注,但由于不是自己研究所得,故很

①⑨ 谢观著、余永燕点校、王致谱审定: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,第85页;第26页。

②⑥ 胡道静:《吕诚之先生〈医籍知津〉稿本题记》,附见吕思勉:《医籍知津》,氏著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,第69页;第210页。

③⑤ 参见李永圻、张耕华编撰: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卷二“1912—1925年(29—42岁)”,第265页;第224页。

④⑦ 吕思勉:《医籍知津》,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,第6页;第12页。

⑧ 参见谢观著、余永燕点校、王致谱审定: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第五节“《素问》考证”,第15页。

难留下印象。当其读到后文“伤寒杂病论论集自言”一语时,由于“论集”一词较为生僻,少有与“自言”连用者,遂轻疑为文字衍误,而据平常所用之俗本《伤寒》径改两字作“序文”,浑然忘记了前面那条不起眼的按语。一时疏忽大意造成的罅隙,替后人留下了追踪《源流论》来龙去脉的痕迹,这大概也算是千虑一失吧。

《知津》一书的内容与观点同吕氏著作中涉医部分高度相似者,不是仅此一例,而是数量众多。比如,在《知津》开篇,诚之先生就比照儒学的发展,对中国医学史进行了分期:

中国医学,可分数期:自西周以前,为萌芽之期,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,两汉之世为专门传授之期,魏晋至唐为搜葺残缺之期,两宋至明为新说代兴之期,起自明末,盛于有清,为主张复古之期。(中略)若《灵枢经》,则黄帝针灸一派也,若《本经》,则神农本草一派也,若《难经》,则素女脉诀一派也;其笔之于书,盖亦在周秦之际,皆专门学者所为也(中略)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,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,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,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(中略)此其专家授受,各有师承,犹两汉之有经师也(中略)其中绝不知何时,然亦必当汉魏之际,故后此治医学者,若皇甫士安,若陶弘景,皆无复口说可承,而徒求之于简编也。其蒐讨掇拾之功最巨者,于隋则有巢元方,于唐则有孙思邈、王焘。此医家义疏之学也。北宋以后,新说渐兴,至金、元而大盛,张、刘、朱、李之各创一说,竞排古方,犹儒家之有程、朱、陆、王,异于汉而又自相歧也。至明末而复古之风渐启,清代医家多承之,则犹儒家之有汉学矣。^①

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,极具见地,堪称《知津》的核心论点与总纲,深受吕先生重视,全稿多处皆有申述与阐发。而在1933年10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刊行的先生著作《先秦学术概论》第十章《方技》中,也有一段非常近似的话:

中国医学,可分三期:自上古至汉末为一期(中略),此期医学,皆有专门传授,犹两汉经学,各有师承也。魏晋而后,专门授受之统绪,渐次中绝。后起者乃务收辑古人之遗说,博求当世之方术(中略),此一时期也,务缀拾古人之遗逸,实与南北朝、隋、唐义疏之学相当也。北宋时,士大夫之言医者,始好研究《素问》,渐开理论医学之端。至金、元之世,名医辈出,而其业始底于成。直至今日,医家之风气,犹未大变。此一时期,盖略与宋、明之理学相当。清儒考据之学,于医家虽有萌蘖,未能形成也。^②

对比两说,关于中国医学的分期如出一辙,不同之处仅是后出者的文字更为精炼整齐而已。类似若合符节的地方并非仅见,在吕氏著述中还有不少,如关于“五运六气说”的讨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《知津》九《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》有云:

中国医学,至宋而新说肇兴,非得已也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,必得其理,然后可以应用于无穷。古代专门授受之医学,魏晋而后既已寢失其传,其为后人所辑存者,皆不免于残阙不具。夫古代之医学即使书存于今,其理亦未必可据,况其所存者又皆残阙不具之说乎?!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,后世解剖之学既已绝迹,形下之学又日湮晦,欲明医理,果何所据以资推求哉?于是冥心探索,而其说转遁入于虚无,而五运六气之说兴矣。^③

赵宋之时,五运六气说与医学的合流,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巨大转折,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中医发展轨迹。诚之先生独具只眼,指出了其中隐伏的脉络,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。这样的创见,自然是学者的得意之论,故先生于此亦三致志也,在不同著述中都有阐发:

自五代以前,习医者多守其专门之业以相传授,其人多今草泽铃医之流,士大夫之好斯事者甚少,则亦安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已。自宋以后,士大夫之研究医术者始多,始欲求得其原理。然古代相传之说,本止有其术而无其理,加以人体生理日以湮晦,药物化学又无门径,术之不明,理

①③ 吕思勉:《医籍知津》,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,第3—5页;第23页。

② 吕思勉:《先秦学术概论》,同上书,第569—570页。

于何有？于此而欲强立一说焉以会诸说之道，则愈笼统污漫不着边际之说，愈适于用，此中国医家之所以好谭阴阳五行也。^①

又：

北宋以前，医经、经方两家，皆偏于治疗之术，罕及病之原理。虽或高谈病理，乃取当时社会流行之说，如阴阳五行等，以缘饰其学，非其学术中，自能生出此等理论也。宋人好求原理，实为斯学进化之机。惜无科学以为凭借，仍以阴阳五行等，为推论之据。遂至非徒不能进步，反益入于虚玄矣。^②

又：

医学至宋而一变。自唐以前，医家多讲治法，罕言医理，宋世乃多言理，而五运、六气等说兴焉。然其转变之原，亦在唐世。何者？前此视医为贱业，士大夫弗为，至唐乃渐为之，士大夫为之，斯言理矣。^③

上所举中国医学史分期、宋代医学新说的肇兴都是《知津》中非常重要的观点，除此之外，不少局部甚至细节方面的论断，也能够吕氏的其他论著里找到相似的表达。兹举两例，以概其余。对于中医的独门之技“诊脉”，诚之先生有着迥异流俗的见解：

脉学原起亦甚古。近人多诋其术之不足恃，然古言四诊，切本居末，后世医论，遇有证脉相违者，亦多主舍脉从证，间有主舍证从脉者，则必逆知此证将有变动，不当徒泥目前之证以施治，而此证究竟将有变动与否，则藉脉象以参之，非徒恃切脉遂可治病也。故切脉者，诊察之一术而未足语于诊察之全也。然世之知医者少，皆视医为神妙不可测之事，以证为人人所共见，脉为医家所独知，遂谓医之于脉，别有不可言传之妙，而医家亦借此自炫，以欺愚昧，其流失几谓专凭脉象，便可治病，此流俗人之言，非学人之论也。^④

在先生数量庞大的读史札记中有一条立论和措辞都很近似的文字：

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，甚者谓能诊脉，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，此乃欺人之谈，少明事理者不之信，即医家之少明事理者，亦不以此欺人也。……脉学之兴，盖本诊察之一术，所以补但凭证状者之不足，以求详慎，非谓恃此遂可忽视证状。……后世医家，遇有证脉不合者，多舍脉而从证；以证固明白可据，脉究凭探索也。间有舍证从脉者，乃经验多，知目前之证将有变化，不宜徒据之以为治，乃逆测未来以立法，实无所谓从脉也。^⑤

诚之先生曾谦虚而又自信地说：“少时读史，最爱《日知录》、《廿二史札记》，稍长，亦服膺《十七史商榷》、《癸巳类稿》。今自检点，于顾先生殊愧望尘，于余家差可肩随耳。”^⑥这绝非泛泛之言。对中国学术史稍有了解者，都应该清楚地知道此话的分量。自古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均很重视读书札记的撰写，非独得之见不存，去取甚严。此条有关“诊脉”的札记，如果暗合他人旧说，吕先生当会删去，以示无意掠人之美，但并未摒弃，可知是个人创获。《知津》有与之相合的论述，显然也不会只是出于巧合。至于相似的细枝末节式的观点更是在在皆有，比如《知津》十六《明清间诸医学名家》对清代医家徐大椿的医学造诣推崇备至：

其卓然可称大家者，实无过徐灵胎。灵胎于各科古书，靡不攻究，实足当博大精深之目。^⑦衡量杰出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下，往往见仁见智，由于容易带有主观色彩，反倒较能显现出评价者的真实

① 吕思勉：《论医》（七），李永圻、张耕华编撰：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卷二“1912—1925年（29—42岁）”，第210页。

② 吕思勉：《先秦学术概论》第十章《方技》，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，第570页。

③ 吕思勉：《隋唐五代史》第二十二章《隋唐五代学术》第六节“自然科学”，第1137页。

④ 吕思勉：《医籍知津》五《脉经与脉学》，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，第14页。

⑤ 吕思勉：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丙帙“魏晋南北朝”第五四七条“脉法”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989页。

⑥ 吕思勉：《自述》，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756页。

⑦ 吕思勉：《医籍知津》，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，第46页。

身份。上引之言在《论医》(十三)中恰巧亦有一段孪生式的表述:

中国近世医家,予最服膺徐灵胎,以其读书最多,于各科多所通晓,且持论最谨严,在近世医家中较有轨范故也。^①

众所周知,但凡严肃负责的学者,对于自己通过独立思考与研究而得出的结论,都不会轻易动摇改变。上所举《知津》中的部分观点,在吕氏其他相关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,可谓一以贯之,说明这些创见最有可能是由诚之先生提出的,再结合前文列举的各种证据来判断,则吾人可完全肯定《知津》确系吕思勉先生亲笔之著。

四 结 语

祖述宪先生对吕思勉先生为什么赞同《源流论》署谢观之名,很感费解,其实类似的事情早有先例,甚至在清代就已蔚然成风。清人汪中,高才博学,然命途迍蹇,坎坷无所遇,一生主要以游幕维持生计,其传世之著《述学》就收录了不少捉刀代笔之作。当时,幕主和幕僚皆习以为常,后世对此亦抱理解的同情。与之相比,目录学经典《书目答问》作者署名之争则更为有名——该书究竟是出自张之洞手笔,还是南皮命门下士缪荃孙代撰,晚清以降,学界聚讼哄然,迄今仍无定论,这同《源流论》的成书颇有相似之处。虽然谢、吕二人的关系并非主从或者师生,但前者介绍后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,以助己编纂《中国医学辞典》,就此事性质来讲,不能说没有丝毫主客之别,故诚之先生才有“属予襄理”之言。从这个角度看,谢氏视《源流论》为己作,亦非全然无据。

吕先生本是“一位朴质恬淡,循规蹈矩,不扬露才学,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”^②,其半生坚持执教光华大学,就深为世人敬佩称颂。据吕门弟子黄永年先生回忆:“在抗战前,吕先生早已是一位在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了,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。论理当时北京大学文科是全国头块牌子,而吕先生所在的光华大学则是排不上号的私立学校。但吕先生拒绝了,理由是:光华的文学院院长钱子泉(基博)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,我离开光华,等于拆他的台,我不能这么做!”^③在《自述》中,吕先生亦曾提及此事,不过道出了另一番理由:“人有问予:在光华二十余年,他校相招者甚多,条件多优于光华,何以终不迁改?其大原因,亦在懒惰,惮于迁改而已。”^④两条理由都出自吕先生之口,却截然不同,似乎自相违背。不过,窃以为两者实际各说出了事实的一半,合而观之,应该才是真相的全体。所谓不愿拆老朋友的台,乃重然诺之义;而惧怕迁改,则是反求诸己之仁。受友人之托,必全力以赴,不计个人得失,功成之后更不矜炫于世,这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适堪连类。因此,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吕先生为何终生不曾公开谈及《知津》书稿一事,而且还认可《源流论》出自谢观之手了。

客观地讲,谢氏所做补充删改亦自有其价值,故吾人认为《知津》与《源流论》不妨并行于世,供读者参考比较。但君子爱人以德,既然两书的关系已经得到澄清,那么,我们就当遵先圣“必也正名”之训,还后者署名之本来面目,将其改题作:“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,吕思勉撰,谢观增订。”

(责任编辑 孔令琴)

① 李永圻、张耕华编撰:《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》卷二“1912—1925年(29—42岁)”,第212页。

② 严耕望:《治史三书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8年,第180页。

③ 黄永年:《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(思勉)先生》,《黄永年文史论文集》第5册,北京:中华书局,2015年,第248页。

④ 吕思勉:《自述》,《吕思勉论学丛稿》,第752页。